

※ 读者说

# 我们为什么爱读汪曾祺

徐则臣

海明威在《午后之死》中写道：“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，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。”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来说也如此，他在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的可能仅仅是这个人的八分之一，他背后的写作资源、精神谱系十分复杂。我在梳理汪曾祺先生创作的时候，就发现像进入了一个迷宫。

汪曾祺的创作受到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影响，西方的现代主义、佛教和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，他对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也很深入。很多人认为，汪曾祺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，甚至扯不上关系。他的确不是那种跟现实亦步亦趋、与时俱进的作家，但绝非无视和游离，他跟时代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种。

《受戒》这样的作品，汪曾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写出来？它跟同时代的作品区别显著，当然汪曾祺的出现，也跟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一直到90年代，这十年来是汪曾祺先生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段。那个时候流行的是伤痕文学、寻根文学、先锋文学，尤其是后来的

先锋派，以决绝的、高蹈的乃至游戏的创作姿态，去反拨此前文学跟现实之间零距离的关系。文学风潮有极大的裹挟性，它会形成一种意识形态，影响我们对文学的判断，所以很多作家没能力逆流而动，也没勇气改弦更张。而汪曾祺先生这时候选择了逆流而上，或者说根本不是逆流，他只是顺流而下，顺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之流来写，所以创作出了这些“另类”的作品。

汪曾祺对自己的散文化写作有十分清醒的认知。他认为自己散文化写作的最大诉求是和谐，他不喜欢刻意的、严格的布局结构，主张信马由缰，写到哪儿算哪儿。散文化的小说，往往没有非常起伏的、戏剧化的、有冲突的故事，靠什么吸引读者？靠的是韵味、格调、格局，靠的是作品背后的作家的人格力量，靠的是作家这个人和语言的修为。这也是沈从文和汪曾祺这类型作家厉害的地方，他们不作传统意义上的曲折故事，但依然能让读者沉醉其中。

对我们今天来说，汪曾祺的创作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。一是他的短篇小说美学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，只

写短篇小说且蔚然卓著者，可能就两位，一位是鲁迅，另一位就是汪曾祺。汪曾祺在自述中说，他只会写短篇，或者说他只熟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。一个人是写短篇、写中篇还是写长篇，受制于他的思维模式，写短篇的时候有短篇思维，写中篇的时候有中篇思维，而写长篇则是长篇思维。我写完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，有一段时间回头写短篇，怎么写都不对，开个头就觉得是长篇的表达方式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都下不了笔。后来，我重新大规模读短篇，一点点找回短篇的感觉，重建了短篇思维后再写，才顺当了。

汪曾祺的小说都比较短，最长的《大淖记事》也只有一万七千字，有人说这个小说写得好啊，能不能把它拉长，变成一个中篇？汪曾祺一口拒绝，说这就是它该有的样子，如果拉长了就不是现在这个小说。他认为短篇就是短篇，不存在可以作为长篇的短篇，也不存在可以作为短篇的长篇。一个文体有一个文体的质的规定性，这是艺术规律，我们写作时不能乱来。

对汪曾祺小说深入追究后我们会发现，有几个概念纠缠到了一块儿，比

如乡土文学、现实主义、现代主义。汪先生一直不赞成自己的文学被称为乡土文学，因为当时流传一个观点，很多人习惯以乡土文学为借口去反对现代主义。汪曾祺说：“我认为我的作品是现实主义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排斥现代主义，我认为我的作品里面有现实主义中有现代主义。”他同时提到：“我主张回到现实主义，回到民族传统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排斥西方文学的影响，我希望我在写中国式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时候，能够融入西方的一些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。”

汪曾祺在80年代后期开始写系列小说《聊斋新义》，这是汪曾祺对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部分作品的“重述”。大家都知道《聊斋志异》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瑰宝，是古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，汪曾祺为什么要晚年重述“聊斋”？这其中蕴藏着他对传统的想法。把传统的和现代的、本土的和国外的融合起来，最终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传统。这也是我在今天重读汪曾祺作品的时候，在作品本身之美、意蕴、作家修为等提醒之外，更为看重的一个启示。

（选自《文艺报》）

※ 读书文化

## 尽信书，不如无书

何其芳

有的时候，书帮助了我们，也害了我们。

这话又怎样讲呢？

详细一点说，有的书，说了一些真话的书，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，推动我们迈向人生的正途；而有的书，那些说假话的书，则使我们头脑糊涂。

说来话长。姑举一例以明之。

有相当长一个时期，我对拜伦这个人没有好感。其实我并没有好好读过他的诗，而心里却有了成见，你说怪不怪呢？这完全是法国的有名的传记作家兼资本家安德烈·莫洛亚的《拜伦传》害了我的。

莫洛亚先生的文章是蛮轻松的，我读了他的《雪莱传》，就又去找他的《拜伦传》来读。那已经是1934年左右的事情了。现在还大约记得的，是他写拜伦与其同父异母的姐姐有恋爱关系，同居关系。而且，他不断地和这个女的好，又紧接着和那个女的好。在意大利时，他过着很奢侈的生活，只要他一出游，后面就跟着载鳄鱼、猎犬和女人的车子。总之，书中把他写得很荒淫的样子。过去关于拜伦的一点知识抵抗不了

这种影响，于是在我的脑子里，他就成了一个单纯的“唐璜”了。

一直到抗战以后，读了勃兰兑斯的《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》中讲拜伦的那一章，我脑子里的拜伦才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：才活生生地感到他是一个自由与民主而战的猛士，一个狂暴地震动了英国当时的统治阶层，因而受到压制、迫害与诽谤的反叛者。而这正是他成为大诗人的主要原因。

爱伦堡有一篇文章，其中说到莫洛亚是个工厂的老板，而他开舞会时的奢华铺张，光怪陆离，刚好说明他自己正是一个骄奢淫逸、荒诞不经的家伙。他之所以讨厌拜伦，并把拜伦写成一个讨厌的人物，岂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吗？

尽信书，则不如无书。孟子夫子这句话有些道理。但是他这句话也不可尽信。问题在于看是什么样的书：说假话的书抑或是说真话的书。如何辨别这两类书，与辨别真假都有的第三类书中真话和假话，除了具有必要的知识积累之外，主要还得靠我们读书时，须有一种思索的批评的态度。

（选自《读者》）



※ 读书撷英

## 读书就是读自己

席克让

想起来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书，莫过于小学时的连环画，特别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一套48本，一本一毛五，整套的买不起，大家商量好你买这本，他买那本，回来换着看。即便如此，也没能看全，但丝毫不影响对这套书的痴迷：刮骨疗伤的关羽、血战长坂的赵云、怒打督邮的张飞……他们特定的表情至今还那样清晰。在连环画的感召下，竟想到了原著。几个小伙伴一合计，凑了六块四买了一套《水浒传》，但面对半文半白的语句和太多生字，只好囫囵吞枣地读了。

上中学后，无意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中央一套节目中午十二点半播的听不上，就听二套晚上九点半播的。刚好下自习，把收音机藏在被窝里偷偷地听，不但没有影响学习，还时刻被孙少安和孙少平的精神鼓舞着。

真正的读书，是从所谓的“考上学校”

后开始的，雨果、莎士比亚、塞万提斯、托尔斯泰、海明威等文豪的代表作或成名作是首选，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。看完之后，终于明白巴尔扎克为啥说“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”。临近毕业分配时，《白鹿原》问世了，还没读完，就觉得是中国版的《静静的顿河》。那时候还喜欢诗歌，唐诗宋词是必须的，也特喜欢中国近现代的诗，从徐志摩、戴望舒到北岛、舒婷等，现在还记着一些闪光句子。

工作之初，慢慢地对《围城》爱不释手了，然后是《写在人生边上》《人兽鬼》等，但遗憾的是，由于自身素质，到目前还没有勇气和能力研读钱老的《管锥篇》。

就在近几年，发现阅读的社科类图书太少，就听从一位领导建议，从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这两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文章开始，逐步将自己的阅读习惯向哲学以及历



史学领域延伸。“平语近人”系列、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《简明美国史》以及张维为的《中国三部曲》都给人很好的启发，增强自信外，还为党课增添了不少有力、有据、有趣的旁证。

纪录片、有声书等多媒体图书资料极大地丰富了阅读空间，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，再比如“学习强国”推送的历史方面的有声书，让你借助历史这面镜子看看周围和自己，有种豁然开朗的释然。

朋友聚会，谈天说地间，有人感慨道：高中那会，读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觉得自己就是孙少安，可现在觉得越来越像王满银……话音未落，众人抚掌大笑，但紧接着就是一个短暂的集体沉默——这沉默包含着诸多无奈、愧疚、失落……其实读书就是读自己，从你读过的书里，也能读出你的追求、爱憎、喜怒和你的成长历程。

（选自每日甘肃网）

公益广告

# 心头常亮红绿灯 文明交通伴我行

